

# 山西定襄关王庙考察札记

王子奇

【摘要】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结合对关王庙大殿现存木构和相关文献的梳理分析认为，大殿在北宋宣和五年初建时，前檐应为三开间，使用制同后檐的阑普组合，且平柱应在现明间两侧补间铺作下；元至正年间对大殿进行修葺时，前檐改用檐额，并改换前檐平柱，移至今天的位置。关王庙大殿是檐额制度在元代继续使用的重要实例例证。本文同时通过对檐额做法和金代早期木构建筑使用内额做法的分析，指出二者在做法上应具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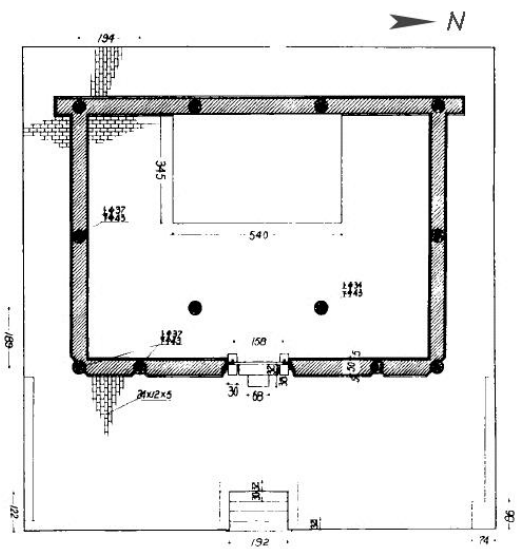
【关键词】关王庙 原貌 年代 檐额

近年来，随着木结构纵架体系等研究的逐渐深入，陆续出现了一些研究成果，使得我们对于相关问题的认识逐渐清晰起来，对诸多古建筑个案的认识也逐步深入和丰富起来，定襄关王庙即是其中一例。而定襄关王庙大殿在年代判定、后代重修历史以及檐额承重结构等问题上都有一些特殊之处值得注意，故而对比已有研究及其他相关资料，草成札记一篇。

## 一 关王庙大殿的原貌

在讨论所有问题之初，有必要首先讨论关王庙大殿的原本面貌，这将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和分析关王庙大殿的修建年代及大殿前檐明间的檐额承重结构。

关王庙大殿坐西向东，面阔三间，进深两间，单檐歇山顶。大殿前檐明间特宽，前檐平柱约与后檐二次间补间铺作相对，后檐平柱则与前檐明间两侧补间铺作相对，形成前檐明间较二次间远大的平面格局（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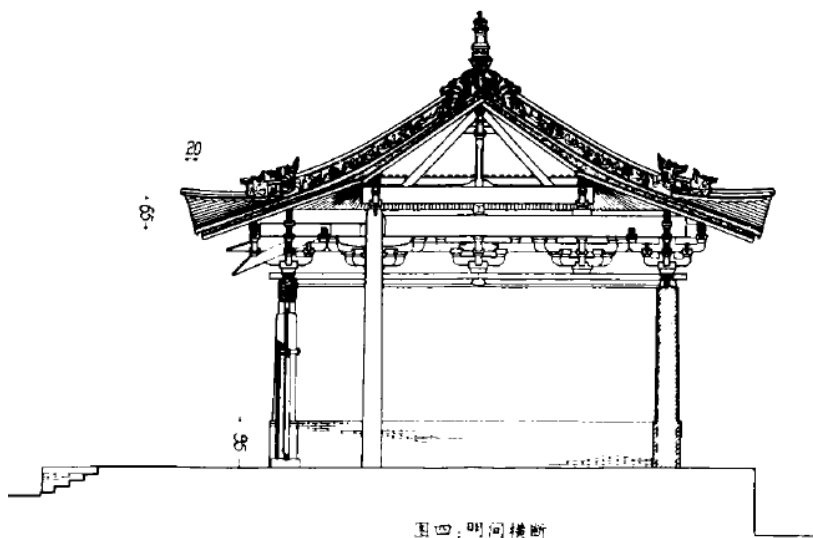
图一 定襄关王庙大殿平面图

（引自李有成：《定襄关王庙构造浅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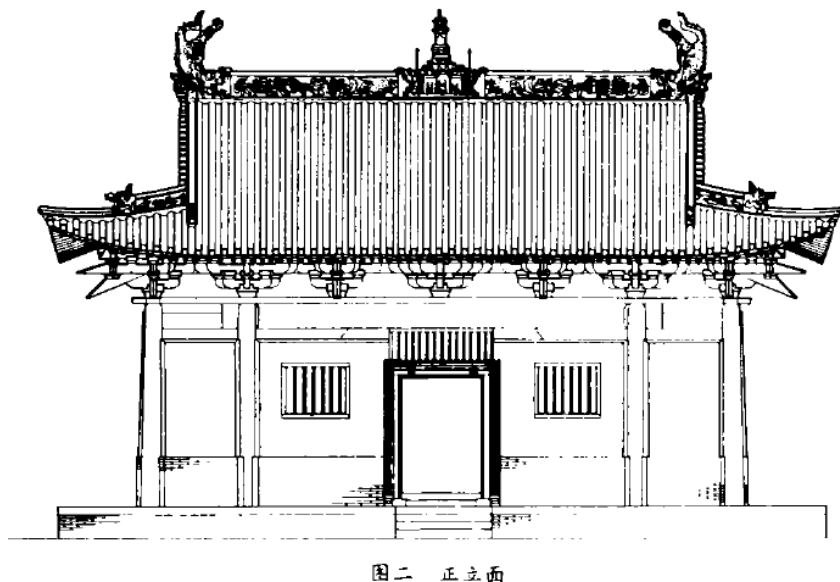
前檐二柱头铺作出 45 度斜栱；明间之内用补间铺作三朵，当中一朵出 45 度斜栱，其余两朵不用；次间不施补间铺作。后檐及两山柱头铺作不出斜栱；每间施补间铺作一朵，出 45 度斜栱（图三、四、一一）。

大殿前檐明间使用极其肥大的檐额，出明间则止。次间阑额形制正常，在角柱处未出头，另一端插入明间檐额之中，上皮与之相平，下面用砖填补二者间的高差，再下施由额。由额穿明间柱而出，置于明间檐额之下，斫斫成楹头绰幕。阑额之上施普拍枋，在角柱处直截式出头（图三）。

以上这些形制，反映出关王庙大殿的一些独特之处。其一，大殿的平面格



图二 定襄关王庙大殿明间横剖面图 （引自李有成：《定襄关王庙构造浅探》）



图三 定襄关王庙大殿正立面图 （引自李有成：《定襄关王庙构造浅探》）

局较为特殊，即前檐明间较二次间远为宽大，立面上在普拍枋下使用两端插入两侧柱子的檐额。其二，关王庙大殿柱头、补间铺作均出斜栱，而不像宋金元时期其他使用斜栱的建筑，一般或者全用于补间，或者全用于柱头。同时，关王庙大殿的斗栱，无论从其比例或做法上，都具有典型的宋金风格<sup>1</sup>。而前檐使用横额，则是晋西南和陕西地区元代建筑的中的常见做法<sup>2</sup>。由此反应的斜栱出跳位置的

<sup>1</sup> 详见本文第二小节。

<sup>2</sup> 一般认为，目前学术界对于元代木构建筑的认识，主要是基于山西和陕西地区，特别是晋西南和陕西韩城地区的元代大木作研究基础之上得出的。对于元代大木结构的特点，可以参看张驭寰：《山西元代殿堂的大木结构》，《科技史文集》第2辑，上海科技出版社，1979年；潘谷西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四卷（元明卷）第九章之“剧变中的元代大木结构”，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3月。



图四 大殿前檐及南侧山面



图五 大殿前檐北侧平柱

特殊做法和斗拱与横额做法的时间分野，成为认识关王庙大殿建筑的两个疑问。

作者在 2007 年 4 月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文物建筑专业在定襄关王庙进行文物遗产参观教学实习时，领队教师徐怡涛先生在考察现场向学生讲解大殿建筑时指出“大殿前檐横额可能是后代修缮时添加”的判断，则很好地解释了以上的两个问题。这一判断首先缘起于大殿斗拱与前檐横额做法上的时间分野所引起的疑问。徐怡涛先生指出，定襄关王庙的斗拱具有典型的北宋形制特点，应为北宋晚期建筑。现场考察时，徐先生指示我们观察大殿前檐普拍枋的拼缝与前檐柱头错位，施于明间当心斜拱两侧的两朵补间铺作下（图五）。与前檐不同，大殿两山及后檐的普拍枋拼缝俱在柱头铺作下，且前檐的两颗平柱与其他檐柱相比未做柱头卷杀，时代明显偏晚。这些因素综合起来，证实了前檐明间被后代改动，明间原有檐柱分别向外移半间，形成现有明间三朵补间铺作、用檐额的面貌，造成了晚期建筑的假象。实际上，关王庙原构的前檐斗拱布局应为补间用一朵斜拱，且不用檐额（图五、一〇、一一）。

## 二 关王庙大殿的年代

关王庙大殿的年代问题，也值得注意。此前研究中，对于关王庙大殿的年代大体有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关王庙大殿为元代遗构。这是老一辈学者在上世纪 50 年代考察定襄关王庙后在《两年来山西新发现的古建筑》中提出的<sup>3</sup>。该文认为，关王庙大殿“从法式来看，仍保留了许多元代结构特征”，但未指明是哪些做法。后来一些研究者认为，可能是当时的调查主要着眼于内部梁架分析，而未对其平面布局的特殊性导致的结构、斗拱布置的特殊性予以特别注意<sup>4</sup>；而关王庙明间上的横额，与元代建筑中广泛使用的大额承重式结构不仅外观、且结构逻辑极为相似所造成的<sup>5</sup>。

第二种意见认为关王庙大殿为金代建筑。持此意见的研究者，首先着眼于定襄关王庙大殿建筑结构的形制特点，认为定襄关王庙大殿并非元构，且与同一地

<sup>3</sup> 见祁英涛、杜仙洲、陈明达：《两年来新发现的古建筑》，《文物参考资料》1954 年第 11 期。其中，定襄关王庙部分由祁英涛先生执笔。

<sup>4</sup> 任青田：《山西省定襄县关王庙大殿建筑》，《古建园林技术》2006 年第 4 期。

<sup>5</sup> 李志荣：《元明清华北华中地方衙署个案研究》第三章第一节之“绛州大堂和霍州大堂结构的来源”，北京大学 2004 年博士论文。



图六 大殿明间南缝梁架



图七 大殿前檐明间补间铺作



图八 大殿前檐南侧柱头铺作及转角铺作



图九 大殿前檐转角铺作里转



图一〇 大殿山面铺作



图一一 大殿后檐明间铺作

区的佛光寺文殊殿（金天会十五年（1137）重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sup>6</sup>；并根据关王庙殿内保存的金泰和八年（1208）《新创关王庙记》碑记，结合对大殿大木做法的认识，认为关王庙大殿为金泰和八年所建<sup>7</sup>。但是，在认为关王庙为金代建筑的研究者中，已有人进一步指出从木构留存情况看，大殿的斗拱、梁架和细部装饰做法均早于佛光寺文殊殿，惜未说明依据<sup>8</sup>。

<sup>6</sup> 任青田：《山西省定襄县关王庙大殿建筑》，《古建园林技术》2006年第4期。

<sup>7</sup> 李有成：《定襄关王庙构造浅探》，《古建园林技术》第1995年第4期。任青田：《山西省定襄县关王庙大殿建筑》，《古建园林技术》2006年第4期并参。

<sup>8</sup> 李志荣：《元明清华北华中地方衙署个案研究》第三章第一节之“绛州大堂和霍州大堂结构的来源”，北京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

第三种意见认为关王庙大殿建于北宋宣和五年（1123）。这个看法首先着眼于金泰和八年《新创关王庙记》碑记的记载，指出泰和八年只新塑关羽像而并未重建大殿。并根据收录在《山右石刻丛编》和《定襄金石考》中的《新修昭惠灵显王庙记》碑记，考定关王庙大殿的始建年代应为北宋宣和五年<sup>9</sup>。

对这三种不同的年代意见，应先从关王庙大殿的建筑做法入手分析。大殿本身的建筑结构已经有关学者介绍，兹不赘言，仅分析相关做法。

首先，关王庙大殿梁架属山西地区北宋至金代的常见做法<sup>10</sup>。大殿前檐明间两侧的补间铺作和前檐角铺作为五铺作单杪单下昂，华拱仅露出很小一段，被昂打断成华头子模样。昂为批竹式，中央起棱昂嘴出峰。耍头平出，形式如昂。令拱与耍头相交承替木及撩檐枋，两端抹斜；前檐角铺作的令拱在另一侧出带有内凹曲线的蚂蚱头。前后檐及两山扶壁拱均为泥道单拱叠素枋做法。

上述铺作组合是宋金时期山西中北部地区常见的铺作次序，但华拱跳头上不置交互斗，状若放大的单瓣华头子直接承昂则为不常见的形制。批竹式中央起棱是山西中北部地区北宋至金中前期流行的下昂形制；耍头平出斜杀是山西中北部地区自唐五代至辽宋时期的常见做法，但形制如昂、批竹起棱则是自北宋至金中前期均常见的耍头做法<sup>11</sup>。另外，如前檐角铺作令拱出跳相列做蚂蚱头，以及大殿内部置于三椽栿之上的丁栿后尾所做的蚂蚱头，也是北宋中后期至金常见的做法。泥道单拱叠素枋的扶壁拱形制是晚唐至金代中前期北方地区最流行的作法，金大定以降，泥道重拱叠素枋的作法在山西日趋普及<sup>12</sup>。

此外，如前所述，关王庙大殿的斜拱在初建时均用在补间铺作位置。除明间当中补间铺作自第一跳和第二跳华拱头上出斜拱外，其他补间铺作均从第一跳华拱上出 45 度方向的斜拱，里外跳的形制也基本一致。更值得注意的是，大殿四角转角铺作两侧的斜拱后尾都与抹角梁结合，形成三角形构架承托角梁后尾，构成类似隆兴寺摩尼殿的斜拱构造，具有很强的结构性。以上这些特点，都是北宋中晚期至金早期斜拱的鲜明特点。

而关王庙大殿前檐带有较浓烈的元代建筑特色的横额，依前文分析，不是关王庙大殿始建时的原构，而是后期修缮时添加的扰动构件，不能作为判断关王庙大殿始建年代的依据。因此，据大殿的现状，尤其是斗拱形制来看，大殿木结构具有较强烈的北宋中晚期至金中前期的风格。

明确这一问题之后，再分析有关大殿年代的文献记载。以前作为辅助判定关王庙大殿为金代建筑的金泰和八年《新创关王庙记》<sup>13</sup>，有记载如下：

将，以义为主，勇武辅之，然后可以不耻于物议。……襄人银匠胡汝辑，年七十有五，性好施，特输己财立塑像于县北灵显王庙西庑之别室，以为乡民香火之地。……时泰和八年岁在戊辰重九日丙午将仕郎赵申记。

<sup>9</sup> 续八宝：《定襄关王庙之谜》，《沧桑》1995年第6期。

<sup>10</sup> 关王庙大殿彻上露明造，四架椽屋箭牵对三椽栿用三柱。平梁上叉手与蜀柱并用，叉手捧椽位置为替木与脊枋之间，是山西地区北宋晚期至金代较为常见的做法；蜀柱下用合檐而不用驼峰，则是北宋中期以后的常见做法。

<sup>11</sup> 山西地区耍头平出斜杀的做法可见于五台南禅寺大殿、五台佛光寺东大殿补间铺作、平遥镇国寺万佛殿、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等，在金代建筑中也有使用，见于大同善化寺普贤阁。而耍头形制如昂且批竹起楞的做法是出现稍晚于形制如昂批竹不起楞的耍头做法，可见于太原晋祠圣母殿、定襄洪福寺大殿、五台佛光寺文殊殿、朔州崇福寺弥陀殿、观音殿、太原晋祠献殿等。

<sup>12</sup> 参看徐怡涛：《公元七至十四世纪中国扶壁拱形制流变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5期。

<sup>13</sup> 此碑现镶于大殿内壁。碑记亦见于《定襄金石考》卷一。

其中没有新建殿宇的记述，所谓“新创关王庙”只是在县北灵显王庙西庑之别室新立了一座关羽塑像。再追述收录于《山右石刻丛编》中的《新修昭惠灵显王庙记》碑记<sup>14</sup>，有记载如下：

昭惠灵显王神通广大，神鉴英明，立异功于唐室，进封号于圣宋。……因殿基之北最就高峙，先构紫薇大帝殿，高真仪像，崇饰中严。然后挟以侧堂，东塑十一曜，西列天地水三官□寿星十二元辰之像。后二年，而兹殿雄成，焕丽一新……宣和五年四月初六日。

依照碑文所述，昭惠灵显王庙建成于宋徽宗宣和五年，当时建竣的有正殿、东庑殿、西庑殿等。《新创关王庙记》所说立塑像的“灵显王庙西庑之别室”，指的正是此碑文所记的西庑殿<sup>15</sup>。

结合上文对关王庙大殿形制的判断，可以推定，现存关王庙大殿的始建年代即北宋宣和五年。

关王庙大殿在金泰和八年塑关羽像后，元明清又屡有修葺。元代修葺载于至正六年（1346）《重建昭惠灵显王庙记》碑<sup>16</sup>：

至正乙酉秋，……遂量事期，计徒庸，虑材用，群英协力以猷其功，勤扑斲，树垣墉，陶瓴甃，百工居肆以成其美。复彩绘灵仪，朱绿牖户，金碧棖题，丹其楹，垩其壁，甃其陛，神门翼室洎三灵侯祠悉为一新，轮奐焜煌，翬飞鸟革观者为之起敬。功成，嘱予为记。……至正丙戌冬十月望日立石……

明代修葺见于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重修关王庙记》碑<sup>17</sup>：

余观其庙貌規制，极尽巧思，今之匠作弗能为，意当时地灵物蕃，人多气节，敦崇古道，遂能建忠烈诸祠，以见一时人心之趋向、风俗之淳美也。迄今岁久颓敝，……崇厥台基，腐者易之，仆者起之，尘埋污溃者刷涤而新之。表以石楔，周以垣墉，自塋茨瓴以及墨垩彩髹，罔不精致坚固、协衷称度，遗像绘饰，凜然生气……

清代修葺见于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重修关王庙并周围墙垣记》碑<sup>18</sup>，碑记中未提及具体修葺内容，仅录施主及工匠名姓。

通过以上这些史料可见，明清的两次修葺，都没有对关王庙大殿进行动及木构的整修，而主要以抽换朽坏构件、重饰塑像彩绘和整修基础、建立墙垣为主。元至正五年至六年大殿的这次修葺，时人称为“重建”，依碑记所载，应确是一次较大规模的整修。结合前文的分析，似可认为这次修葺是对关王庙大殿的落架整修，并改去制同后檐的阑普组合、改用檐额，改换前檐平柱、挪动至今天的位置。

### 三 关王庙大殿前檐的檐额承重结构

关王庙大殿前檐的横额承重结构，已经前辈学者介绍，指出与此前一般认为的大额承重结构有所不同<sup>19</sup>，应为《营造法式》卷五·大木作制度二“阑额”条

<sup>14</sup> 此碑记收录于《山右石刻丛编》卷十八。

<sup>15</sup> 以上有关宋、金两碑记的分析参考续八宝：《定襄关王庙之谜》，《沧桑》1995年第6期。

<sup>16</sup> 此碑现存于关王庙大殿内，碑头已残损，但碑文字迹仍可辨识。碑文收录于《定襄金石考》卷四。

<sup>17</sup> 此碑现存于关王庙大殿内，但考察时翻覆于地，仅见碑阴。碑文据万历《定襄县志·卷八艺文志》转录。

<sup>18</sup> 此碑现存于关王庙大殿内。

<sup>19</sup> 有关大额承重问题，刘临安先生曾经做过专门的研究，称其为中国古代大木结构的“纵向构架”，见其

下提到的“檐额”<sup>20</sup>。但在此前相关研究中,认为关王庙是金代建筑使用檐额的重要实例,并进一步认为关王庙的檐额做法是由承继宋代传统梁柱承重结构向元代大额承重结构转变的一个过渡实例<sup>21</sup>。进而在此基础上,结合对《营造法式》编修背景和其他相关材料的分析,提出如关王庙所使用的檐额做法,可能是宋代适用于衙署大堂这类需要宽大明间的建筑的专门做法。并由此对这一做法的影响做出推论,认为这一特殊的营造方法对传统的柱梁承重体系的改造和可以扩大空间的经验可能被金代建筑继承,并用来扩大非衙署建筑类型如佛殿的室内空间,这或许是金代平面减柱、使用大内额的做法的渊源<sup>22</sup>。对这一推论,研究者惜未给予足够的说明。

通过前文的分析,关王庙大殿的始建年代应在北宋末,其檐额是元至正年间修葺时所加。因此,关王庙大殿并不能视作金代建筑使用檐额的实例,而是元代仍保留了檐额做法的珍贵例证。

其他使用檐额的实例,有梁思成先生在《营造法式注释》中介绍的河南省济源县济渎庙临水亭,该建筑虽年代不确(梁思成先生认为是宋代建筑<sup>23</sup>,刘敦桢先生认为“应为元建,惟石栏则确系宋物”<sup>24</sup>,此后研究者又提出临水亭檐额以下为宋元遗物,而檐额以上为明代重修遗构的看法<sup>25</sup>),仍是我们理解檐额制度的重要实例。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实例,是高平开化寺观音阁(建于金皇统元年(1141)<sup>26</sup>)。观音阁位于开化寺主院东北角的高台上,单檐悬山顶,面阔五间进深六椽,其中前廊进深一椽。观音阁前檐施用贯穿面阔五间的檐额一通,檐额下衬蝉肚绰幕枋,分别贯穿东西梢间和次间。檐额上置普拍枋,普拍枋至角柱出头,檐额不出头<sup>27</sup>。

因此,结合考虑《营造法式》所记载的“檐额”制度,加上关王庙大殿、济渎庙临水亭、高平开化寺观音阁这几处实例,可见在宋、金、元均有使用檐额做法的文献记录或者建筑实例,并在歇山、悬山建筑中均有运用。这说明,檐额做

---

论文《中国古代建筑的纵向构架》,《文物》1997年第6期。文中将纵向构架分为三类,一是以韩城市禹王殿为代表的完全纵架体系;二是以广胜寺下寺大殿为代表的完全不纵架体系;三是以陕西三原城隍庙献殿为代表的假式纵向构架。此后,李志荣在其博士论文《元明清华北华中地方衙署个案研究》第三章第一小节之“绛州大堂和霍州大堂结构的来源”讨论有关大额承重问题时认为,前两者也可以认为即大额承重结构和大内额承重结构。

<sup>20</sup> 《营造法式》卷五中《阑额》条下提到“檐额”制度为:

凡檐额,两头并出柱口;其广两材一掎至三材,如殿阁即广三材一掎或加至三材掎。檐额下绰幕方,广减檐额三分之一,出柱长至补间,相对作榑头或三瓣头。

关王庙前檐的横额与此制度符合,应确为檐额;与阑额不同,起到了承重的作用,而不仅仅只是纵向联系构件,因而在用材上也较阑额广大。

参看任青田:《山西省定襄县关王庙大殿建筑》,《古建园林技术》2006年第4期;李志荣:《元明清华北华中地方衙署个案研究》第三章第一小节之“绛州大堂和霍州大堂结构的来源”,北京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

<sup>21</sup> 任青田:《山西省定襄县关王庙大殿建筑》,《古建园林技术》2006年第4期。

<sup>22</sup> 李志荣:《元明清华北华中地方衙署个案研究》第三章第一小节之“绛州大堂和霍州大堂结构的来源”,北京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

<sup>23</sup> 梁思成:《营造法式注释(卷上)》,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3年。页153。

<sup>24</sup> 刘敦桢:《河南古建筑调查笔记(——1936年5月14日~6月29日)》5月25日条,《刘敦桢文集》第三卷。页143。

<sup>25</sup> 曹修吉:《济渎庙》,《中原文物》1981年第2期;李震:《济渎庙建筑研究》第六章第一小节之“龙亭”,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01年硕士论文。

<sup>26</sup> 柴泽俊:《山西几处重要古建筑实例》之“(七)高平开化寺”,《柴泽俊古建筑文集》,文物出版社,1999年。页163。

<sup>27</sup> 参看徐怡涛:《长治、晋城地区的五代、宋、金寺庙建筑》第二章第一节之“开化寺主要单体建筑形制”,北京大学2003年博士论文。

法至少在北宋时期即已习见或普遍使用，在金元时期得以继续使用，与常见的大额承重体系（前文所述“完全纵架体系”和“不完全纵架体系”）并存。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佛光寺文殊殿（金天会十五年〔1137〕重建）即使用大内额，内额插入两侧金柱，下衬绰幕枋；崇福寺弥陀殿（金皇统三年〔1143〕<sup>28</sup>）也在前金柱间使用内额，且山面丁栿之上承托一绰幕枋，穿过前金柱后，衬于内额之下，并斫斫为榑头式样，与《营造法式》所规定的檐额制度颇为相似。可见，《营造法式》所规定的“檐额”制度似与金代早期的内额做法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但这是否与建筑类型有一定的关系，是否能够说明檐额制度是由承继宋代传统梁柱承重结构向元代大额承重结构转变的一种过渡做法，似仍需进一步考虑。

附记：本文得到徐怡涛老师指导，并蒙李志荣老师给予宝贵建议，谨此并表谢忱！

---

<sup>28</sup> 柴泽俊：《朔州崇福寺》，《柴泽俊古建筑文集》，文物出版社，1999年。页134。